

## 自我效能感：以色列对哈马斯威慑失灵的 认知心理学解读<sup>\*</sup>

杨府鑫 孙德刚

**摘 要：**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军事强国，但哈马斯却多次主动出击、对以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其背后原因值得探讨。本文引入“自我效能感”这一认知心理学概念，分析哈马斯“不屈服”背后的底层逻辑。研究表明，哈马斯的自我效能感即坚持“抵抗必胜”的信念，是削弱以色列威慑有效性的关键。这种自我效能感源于两大底层逻辑：一是哈马斯从军事斗争的逻辑出发，基于工具理性的“历史经验习得”，形成“以弱制强必胜”的信念，认为可以通过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打击，最终迫使以色列屈服；二是哈马斯从政治斗争的逻辑出发，基于价值理性产生“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认为抵抗以色列的殖民主义统治、坚持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联合全球亲巴力量具有正义性，反抗以色列占领成为必须坚持到底的宗教义务，情感动员增强了哈马斯政治斗争的决心和意志。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驱动下，哈马斯自我效能感得以强化，导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威慑战略难以产生效果。

**关键词：**自我效能感；威慑理论；哈马斯；以色列；认知心理学

**作者简介：**杨府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25 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孙德刚，博士，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3-0129-26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sup>\*</sup> 本文系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国在中东博弈的新动向与中国中东战略研究”（23AGJ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 一、问题的提出

威慑(deterrence)是以色列维护国家安全的三大原则之一。<sup>①</sup>在对国家行为体的威慑实践中,以色列深受进攻性现实主义影响,倾向于通过决定性军事胜利消除威胁。但当面对更复杂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时,其威慑战略的目标既不是取得彻底胜利,又不是结束冲突,而是有效管控暴力事件。<sup>②</sup>上述战略思想在以色列官方文件中被冠名“战争间战役学说”(Inter-War Campaigns Doctrine)。<sup>③</sup>在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突袭行动前,以色列的该军事策略被认为加强了以对地区敌对理论的威慑,平衡了国家安全与发展。<sup>④</sup>但是,面对中东地区不同的武装抗以力量,这一策略在实践层面的有效性存在明显不同,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以色列在面对黎巴嫩真主党(以下简称“真主党”)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以下简称“哈马斯”)时的威慑效果差异性。

2006年之后,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形成了一种“不稳定威慑”局面。虽然双方在边境时常发生零星交火,但都极力避免再次爆发地面冲突。<sup>⑤</sup>相较之下,哈马斯袭扰以色列的频次与烈度远超真主党,并促使以色列被迫于2008年、2014年、2023年数次对加沙地带(以下简称“加沙”)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以色列的威慑失灵与哈马斯的“不屈服”立场一体两面。关于以色列的威慑失灵,既有研究更多聚焦从威慑方以色列的角度寻找原因,如关注累积威慑“重

---

① 吴昊昱:《安全、武力与自助: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3期,第74页。

② 陈曦:《解析威慑概念背后的战略文化要素:以美俄以三国为例》,载《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年第2期,第102页。

③ Itamar Lifshitz and Erez Seri-Levy, “Israel’s Inter-war Campaigns Doctrine: From Opportunism to Principl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6, No. 2, 2023, pp. 293–318.

④ Gadi Eisenkot and Gabi Siboni, “The Campaign Between Wars: How Israel Rethought Its Strategy to Counter Iran’s Malign Regional Influenc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of Near East Policy*, September 4, 2019,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campaign-between-wars-how-israel-rethought-its-strategy-counter-irans-malign>, 上网时间:2026年4月8日。

⑤ Seth G. Jones, Daniel Byman, Alexander Palmer, and Riley McCab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Hezbollah,” *CSIS Brief*, March 21, 2024, p. 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ming-conflict-hezbollah>, 上网时间:2026年4月9日。

惩罚”“重拒止”“惩拒并进”等模式各自的优劣差异。<sup>①</sup>从受慑方哈马斯视角来看,绝大多数研究仍选择将威慑失效简单归咎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组织结构上没有正式健全的体制、没有固定的地理空间等,认定组织流动性稀释了威慑方的武力震慑效果。<sup>②</sup>但是,除了这些有形条件外,受慑方的心理因素同样在威慑失灵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从威慑信号的接收与解读偏差<sup>③</sup>、威慑双方的文化背景差异<sup>④</sup>等角度切入。相比之下,借鉴心理学分析框架的研究不常见,深度个案研究更少;对于哈马斯不屈服的原因解释,既有研究更多关注哈马斯实体层面的韧性,如组织架构的去中心化<sup>⑤</sup>、资金来源的多元性<sup>⑥</sup>以及社会基础的广泛性<sup>⑦</sup>等,而对其抵抗心理相关理念与机制的深入探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本文对哈马斯的抵抗心理进行学理化分析,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分析它如何为哈马斯主动打破现状提供认知动力,从而为以色列面对哈马斯时的威慑失灵现象提供新解释。

## 二、“自我效能感”的底层逻辑：理论分析框架

经典理性威慑理论认为,有效威慑的产生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威慑方必须

---

① 陈曦、葛腾飞:《以色列安全战略中的累积威慑析论》,载《西亚非洲》2024年第1期,第102-130页。

② 安维华:《哈马斯现象的宗教—政治解读》,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4期,第6页;刘华清:《“累积威慑”与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演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9-157页;Thomas Rid, “Deterrence Beyond the State: The Israeli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3, No. 1, 2012, pp. 124-147.

③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魏玲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50-109页;Gary Schaub Jr. “Deterrence, Compellence and Prospect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3, 2004, pp. 389-411.

④ Keith B. Payne, *The Fallacies of Cold War Deterrence and a New Directio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1, pp. 40-61.

⑤ 陈天社:《哈马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62页。

⑥ Dexter Van Zile, “World Vision: Strategies for Fund-Raising and Support for Hamas,”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26, 2014, pp. 79-97.

⑦ Abdalhadi Alijla, “Thorny Identity? Non-state Actors, Service Provision, Identities, and Hamas in Gaza,”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34, No. 1, 2023, pp. 195-220.

有确定可靠的能力;第二,威慑方要有在必要时使用这种能力的决心;第三,必须把自己的威慑能力有效地传递给对手。<sup>①</sup>《劳特利奇政治学大辞典》将这归纳为“报复的能力”(capability for retaliation)、“意图的可信度”(credibility of the intent)和“沟通的明确性”(clarity of communication)。<sup>②</sup>据此推导以色列威慑哈马斯的潜在结果如下:能力层面,以色列显然拥有不对称优势;意志层面,以色列试图用武力达到遏制目标的决心毋庸置疑;信号传递层面,经典威慑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以色列的威慑却表现为“先战而屈人之兵”,强调以“对战”与“赢战”来“止战”和“慑战”。<sup>③</sup>这种通过实际动用武力取得物理杀伤与心理震慑,并塑造对手失败记忆的方式,理应达到更好的威慑效果。

但有效威慑绝不仅仅是威慑方自己行动的结果,而是威慑方与受慑方行动总和的结果。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一书中明确指出:“威慑要求把权力、使用权力的意志及受慑方对两者的估计结合为一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项等于零,那么威慑必然失败。”<sup>④</sup>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威慑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2006年,真主党为策应哈马斯的斗争,主动突袭以色列,随后遭受以色列“加倍报复”——以军地面部队进入黎南部开展了大规模行动,史称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战争结束后,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在电视节目中公开懊悔:“如果当初预估到以色列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哪怕以色列做出过激反应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真主党也不会主动发动进攻。”<sup>⑤</sup>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威慑成效显著,2006年之后的17年间,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冲突。其间,以色列持续对真主党保持低强度预防打击和军事威慑,同时并未刻意追求彻底摧毁该组织,双方长期处于“默契”的敌对共存

<sup>①</sup> 朱明权、吴纯思、苏长和:《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sup>②</sup> David Robertson, *The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183.

<sup>③</sup> 罗曦:《美国构建全域制胜型战略威慑体系与中美战略稳定性》,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3期,第45页。

<sup>④</sup> Henry Kissinger,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2, p. 12.

<sup>⑤</sup> Shmuel Bar, “Deterring Nonstate Terrorist Groups: The Case of Hizballah,”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6, No. 5, 2007, p. 483.

状态。

但是,当以色列使用同样的策略应对军事实力明显弱于真主党的组织——哈马斯时,即便以色列取得无数次“战术成功”,依旧无法有效遏制哈马斯。与真主党相比,哈马斯似乎不计伤亡代价而奋起反抗,即便实力悬殊,也会选择主动出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3年10月7日实施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真主党与哈马斯对以色列威慑的反应迥异,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在于双方对与以色列冲突的认知与心理状态存在差异,而非以色列威慑手段本身。真主党对以色列采取“刺激—反应式”攻击,旨在声援受压迫的巴勒斯坦同胞。对抗以色列是真主党广泛政治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核心。对于真主党来说,对抗以色列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因此在遭受以色列打击后,真主党的反应通常是有限的。

哈马斯却不同,它作为巴勒斯坦的主要抵抗力量,与以色列的冲突具有直接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特征。哈马斯从诞生到发展壮大始终深度卷入巴以冲突的漩涡中,如同一个在特定环境中成长并高度社会化的有机体,其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军事目标、政治目标都与对抗以色列息息相关。哈马斯奉行长期抵抗策略。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利德·迈沙阿勒(Khaled Meshaal)的“名言”是:“我们已经抵抗了一百年,并将继续抵抗以色列。”<sup>①</sup>他还对为什么坚持暴力给出解释:“如果我们停止暴力反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就会失去向以色列施压的筹码。在进行最终巴以和谈过程中,如果不向以色列施压,它就不会做出让步。”<sup>②</sup>在以色列强、巴勒斯坦弱的不对称博弈中,哈马斯能够持续存活并成为以色列近20年最大的外部挑战,其背后蕴藏着哈马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信念。

必须承认,“自我效能感”最初是为研究个体的认知与行为而提出的概念。哈马斯作为复杂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其内部决策机制、权力分布以及外部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本文认为,哈马斯在受到以色列威慑时,其复杂的反应可以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自我效能感”加以阐释。

---

<sup>①</sup> Marielle Harris, “Khaled Meshaal: In His Own Words,” *CEP Research*, January 8, 2015, <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blog/khaled-meshaal-his-own-words>, 上网时间:2026年4月9日。

<sup>②</sup> Jeroen Gunning, *Hamas in Politics: Democracy, Religion, Viol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3.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在采取某种行为前对自己能够在何水平上采取该行为活动并取得成功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主体的自我感受。<sup>①</sup> 自我效能感只针对特定任务领域,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个性特质。<sup>②</sup> 故本文研究的哈马斯自我效能感特指其受到以色列威慑时的心理状态。既有研究考察自我效能感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强度。自我效能感较强的个体不会受一时失败的消极影响,而是坚信最终能够战胜重重困难;自我效能感较弱的个体则容易受一时失败经验的影响而怀疑自己,从而在行为上表现出退缩与妥协。<sup>③</sup>

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和提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历史经验中习得正向反馈。哈马斯在巴以冲突中存在类似的认知学习过程。比如,哈马斯多次与以色列成功交换人质,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正向反馈,这一成功经验强化了其在未来继续采取不对称打击的倾向。另一类影响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被称为“情绪唤醒”(emotional arousal)。它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力依赖于个体的主观解释,如主体认知取向、过去经验和当下情境等。<sup>④</sup> 正所谓意义是由学习者积极建构的,即个体“创造了有关世界的意义”而不是“发现了源于现实的意义”。<sup>⑤</sup>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认知,尤其是对其威慑的解读,本质上是一种意义建构的过程,它带有主观偏向性。同样,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下,哈马斯怎样感觉、如何思维和行动,与其说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不如说是以信念为准绳。<sup>⑥</sup> 以色列的武力威慑希望传递警告的信号,但哈马斯却视以色列为“非法压迫者”<sup>⑦</sup>,坚

① 高申春:《自我效能理论评述》,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 年第 1 期,第 61 页。

② 周文霞、郭桂萍:《自我效能感:概念、理论和应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第 92 页。

③ 孔令虹:《自我效能感研究进展》,载《心理学进展》2024 年第 4 期,第 63 页。

④ Albert Bandur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84, No. 2, 1977, pp. 195-200.

⑤ 杨莉萍:《从跨文化心理学到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心理学中文化意识的衍变》,载《心理科学进展》2003 年第 2 期,第 224-225 页;殷融:《论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中蕴含的先锋思想》,载《心理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16 页。

⑥ Albert Bandur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86, p. 36.

⑦ Edward W. Said, “Zio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Victims,” *Social Text*, No. 1, 1979, pp. 7-58; “A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Nederlands Palestina Komitee*, May 1, 2017, <https://palestina-komitee.nl/wp-content/uploads/2017/11/HAMAS-A-Document-of-General-Principles-and-Policies-May-1-2017.pdf>,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8 日。

信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必胜。

综上所述,作为拥有明确意识形态与行动目标的政治组织,哈马斯在面对以色列威慑时所拥有的自我效能感,一是来源于和以色列互动时的历史经验习得,二是其笃信的正义必胜信念。本文据此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哈马斯在抵抗以色列时,如何通过历史经验习得提升自我效能感?其本质是对抵抗行为所造成后果的主观认知与评估,重点关注“抵抗的有效性”。第二,哈马斯对抗以色列时所具有的抵抗情绪如何增强它的自我效能感?在遭受以色列极限施压时,哈马斯理应感到恐惧并选择屈服,但事实却相反:它在遭受打击后往往产生愤怒情绪,这促使它更加顽强地抵抗。这种抵抗情绪的背后蕴含着哈马斯对于冲突本质的先验性认识,即“正义事业必胜”信念,从而坚定抵抗到底的决心。

厘清自我效能感的形成逻辑,为借用心理学概念解释政治学现象提供了可操作化的路径。哈马斯自我效能感的具体构成如下:第一,以弱制强的必胜信念。它基于工具理性,重视经验知识,聚焦军事维度不对称打击以色列的绝对收益。第二,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它基于价值理性,以“反殖民论”“荣誉论”“联合全球亲巴力量论”为核心的认知理念,从政治维度诠释了哈马斯抵抗事业的本质(见表1)。

表1 哈马斯自我效能感的构成

信念基础	逻辑起点	理性前提	核心问题	来源
以弱制强的必胜信念	军事斗争	工具理性	不对称打击可以以弱胜强	近40年抵抗以色列所获得的正面反馈
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	政治斗争	价值理性	抵抗事业具有正义性	反殖民论、荣誉论、联合全球亲巴力量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自我效能感这一分析框架下,学术界可以从多视角解释真主党在面对以色列威慑时,为什么自我效能感比哈马斯弱。从军事斗争的层面看,2006年后,在黎巴嫩国内,人们公开批评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挑衅,指责真主党的挑衅造成惨

烈的后果。为了提高该武装组织在黎巴嫩的支持度,真主党被迫谨慎行事。<sup>①</sup>事实上,在 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长期的小规模交火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交战默契。<sup>②</sup>真主党对双方实力差距有清楚的认识,故常常策划一些不会引发冲突升级的“表演式打击”,比如攻击沙巴农场的无人区。即使以色列实施越过红线的“定点清除”,真主党的反应也只是向以色列边境的军事据点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火箭弹。<sup>③</sup>简言之,真主党从对以军事斗争中获得的经验是:防御比进攻更有利,保持克制比主动进攻更符合该武装组织的利益。

从政治斗争的表现看,真主党融入黎巴嫩政府中,使之受到了制度化约束,迫使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巩固在黎巴嫩议会中的地位。<sup>④</sup>与被困于加沙的哈马斯不同,真主党在黎巴嫩有更广阔的战略纵深,它通过参与议会政治、提升社会服务水平与民众支持度来巩固权力和合法性,无需主动对以色列采取不对称军事行动来证明自身价值;从抵抗意志看,哈马斯的反殖民正义叙事强,反对以色列非法侵占巴勒斯坦人土地;真主党则被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被贴上了“什叶派抵抗轴心”的标签,在对抗以色列时,更多是服务于伊朗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捍卫巴勒斯坦正义事业(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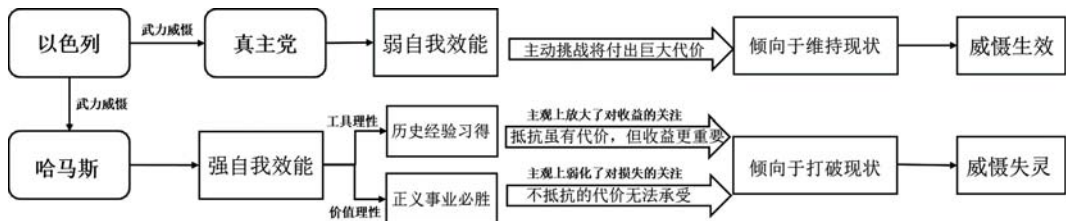


图 1 自我效能感视角下以色列对真主党与哈马斯的威慑效果的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The Role of Hezbollah in Lebanese Domestic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2, No. 4, 2007, pp. 485–486.

② Heiko Wimmen, “Deterrence between Israel and Hizbollah Must Hold,”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October 14, 2023, <https://www.crisisgroup.org/cmt/middle-east-north-africa/east-mediterranean-mena/lebanon-israelpalestine/deterrence-between-israel>, 上网时间:2026年4月10日。

③ Anthony Elghossain, “Israel and Hezbollah’s Dance of Deterrence,”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ly 30, 2020, <https://mei.edu/publication/israel-and-hezbollahs-dance-deterrence/>, 上网时间:2026年4月10日。

④ Yoram Schweitzer, Orna Mizrahi and Anat Shapira, “The Development of Hezbollah’s Deterrence Strategy Toward Israel,” *INSS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26, No. 2, 2023, pp. 6–7.

如图 1 所示,真主党在面对以色列威慑时,历史经验习得以防御性、风险规避为主;哈马斯在面对以色列威慑时,则以进攻性、风险接受为主。真主党对抗以色列的自我效能感较弱,倾向于维持现状;哈马斯对抗以色列的自我效能感较强,倾向于改变现状,反对以色列的霸权主义。哈马斯的自我效能感源于历史经验习得与正义事业必胜信念。

### 三、军事维度的历史经验习得：哈马斯不对称打击的正向反馈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不对称权力博弈中,哈马斯为了生存,选择以工具理性为前提,评估采取某项行为的潜在回报或可能受到的惩罚。在“成本—收益”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更关注哈马斯的绝对收益,其依据主要是哈马斯与以色列的互动经验。在与以色列近 40 年的互动过程中,哈马斯逐渐形成了历史经验习得,由此获取的一系列正向反馈构成了其坚持军事抵抗以色列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削弱了以色列的威慑有效性。

#### (一) 1987~2000 年的哈马斯对以斗争与哈马斯的正向反馈

在哈马斯成立与彻底激进化之前,以方长期默许其前身“伊斯兰中心”(Mujama al-Islami,中文简称“穆加玛”)在加沙发展壮大。虽然以色列早在 1979 年就已经关注到亚辛的激进反以言论,但鉴于当时以色列的主要敌人是法塔赫,巴勒斯坦伊斯兰力量反而成为以色列牵制巴世俗民族主义力量的工具。在以色列军方的默许乃至纵容下,务实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领导层放手与世俗民族主义者展开激烈内斗。<sup>①</sup>虽然哈马斯脱胎于穆兄会巴勒斯坦分支,但两者之间在斗争目标与行事风格上存在根本区别。穆兄会长期认为,打败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只有通过伊斯兰国家的共同奋斗才能完成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尽管哈马斯高举伊斯兰的旗号,但却首先专注于实现巴民族主义目标。不同于巴解组织曾与约旦和黎巴嫩爆发过数次冲突,哈马斯强调不与任何国家为敌,不会损害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

1987 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只是“导火索”。事实上,哈马斯的成

<sup>①</sup> Tareq Baconi, *Hamas Contained: The Rise and Pacification of Palestinian Resistanc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7.

立是对内外两股积蓄已久力量的回应:一方面,它代表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长期占领的不满,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象征;另一方面,它积极响应 1979 年以来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黎巴嫩真主党的崛起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圣战运动等。<sup>①</sup> 在巴以双方陷入对立的大环境中,哈马斯以先锋队姿态引领对以色列的抵抗,能够激发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精神,同时提升自身在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地位。

哈马斯高举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大旗反对以色列,确实让以色列政府措手不及。1988 年 1 月,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以色列)现在面临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它旨在通过煽动普通民众进行暴力示威破坏我们的生存。”<sup>②</sup>哈马斯强势崛起,由其领导的暴力活动逐渐从街头抗争上升为针对以色列军人的“独狼式袭击”。其中,针对以色列士兵阿维·萨斯波塔斯(Avi Sasportas)和伊恩·萨阿东(Ilan Saadon)的绑架案,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军事斗争的转折点。此后,以色列下定决心要对哈马斯采取强硬措施。

1992 年 12 月,哈马斯绑架了以色列边防警察尼塞姆·托莱达诺(Nissim Toledano),目的是用该警察换取被以色列关押的亚辛。作为回应,以色列逮捕了更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以下简称“杰哈德”)领导人和成员,并将其中 415 人驱逐到黎巴嫩南部。然而,此次震慑性驱逐事件不仅未对哈马斯造成根本性打击,反而对以色列自身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来自哈马斯的袭击不降反增,而以色列以暴制暴的应对方式使其在国际舆论中处于更加不利境地。12 月 18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799 号决议,强烈谴责占领国以色列驱逐数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动,指出以色列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美国也支持第 799 号决议,这使得以色列在国际上陷入孤立。<sup>③</sup>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

<sup>①</sup> Magnus Ranstorp, “Inside Hamas: How It Thinks, Fights, and Governs,” *CTC Sentinel*, Vol. 18. No. 10, p. 17.

<sup>②</sup> Dai Richards et al., *The 50 Years War: Israel and the Arabs*, Virginia: PBS DVD Video, 1999, Edition 5, 12: 56–13: 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YKvj9c9JA&list=PLpo-X921v2BDLjkwGwRdop6ixeQt4YKCSJ&index=5>,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24 日。

<sup>③</sup> 关于联合国第 799 号决议(S/RES/799(1992))原始文件,参见 UNDOCS, [https://docs.un.org/zh/S/RES/799\(1992\)](https://docs.un.org/zh/S/RES/799(1992)), 上网时间:2024 年 12 月 18 日。

哈马斯是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其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一名哈马斯成员甚至在圣诞节当晚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拉里·金现场秀”(Larry King Live)节目中,呼吁全世界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困境。<sup>①</sup>这是哈马斯第一次向全世界传播自身意识形态。更让以色列始料未及的是,被驱逐到黎巴嫩的哈马斯成员与其外部领导层——真主党实现了难得的会面机会,以色列此举间接给他们提供了一次进行协调反对以色列的机会。

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以色列的主要敌人正式从法塔赫转变为哈马斯。在以方鼓励下,巴解组织成立了宗教事务部,以期从根源上削弱哈马斯的影响力。<sup>②</sup>以色列辛贝特和国防军同意给予穆罕穆德·达赫兰(Mohammed Dahlan)和吉布里尔·拉朱布(Jibril Rajoub)在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立一支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的权力<sup>③</sup>,其主要职责就是打压以哈马斯为首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自1993年至2000年,哈马斯经历了其组织发展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在国外,1995年约旦内政大臣萨拉迈·哈马德(Salameh Hammad)下发“逐客令”,通知哈马斯领导层中的非约旦籍成员,要求他们必须离境。哈立德·迈沙阿勒曾感叹道:“20世纪9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下简称‘巴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门对我们的严酷打压、对我们领导人实施的酷刑和侮辱,造成了至今仍未愈合的心理创伤。”<sup>④</sup>

综上,这一时期的哈以互动为哈马斯塑造了正向反馈。第一,“前哈马斯时期”的哈以互动表明,以色列的威慑意志不坚定,这源自其长久以来的“分而治之”思想,让哈马斯与法塔赫相互制衡,故哈马斯可利用自身存在进行灵活博弈。第二,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与哈马斯政治影响力的快速跃升,使哈马斯意识到通过持续的暴力抗争不仅可以压制以色列,还能够激发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抗争情绪,进而巩固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地位。以色列历史学

<sup>①</sup> Azzam Tamimi, *Hamas: A History from Within*, Northampton: Olive Branch Press, 2011, pp. 68-71.

<sup>②</sup> Beverley Milton-Edwards, *Hamas: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p. 74-76.

<sup>③</sup> Graham Usher, *Dispatches from Palestine: The Collapse of the Oslo Agreement*,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p. 72-73.

<sup>④</sup> Khaled Meshaal,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HAMAS*, London: MEMO Publishers, 2013, p. 70.

家阿赫龙·布雷格曼(Ahron Bregman)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没有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色列将永远沉浸在‘免费占领’的美梦中,永远不会签订《奥斯陆协定》。”<sup>①</sup>客观来说,这份令哈马斯极度反感的和平方案,恰恰又是哈马斯引以为傲的反以筹码。第三,哈马斯的绑架事件及其后续发展证明,以色列的对哈马斯采取的过激反应非但不能增强其威慑效力,反而有助于哈马斯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提振其民意支持度。第四,巴以和平进程与随之而来的遭受以色列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双重打压,促使哈马斯意识到,仅仅进行武力抗争是走不远的,必须尝试进行政治合法化转型,这为其之后积极参与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埋下伏笔。

## (二) 2000~2006 年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斗争及其正向反馈

在 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前,哈马斯备受以色列与巴民族权力机构双重打压,名存实亡。这场新起义助其绝处逢生,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巴民族权力机构释放了关押在其监狱中的大部分哈马斯成员。此举并不是为了帮助哈马斯,而是有两个隐性目标:一是对以色列施压,使其意识到如果缺少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将急剧恶化;二是为巴民族权力机构提振政治威望创造契机。<sup>②</sup>

然而,巴民族权力机构显然高估了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不同于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时期煽动民众进行街头暴力、发动“独狼式袭击”的情况,哈马斯在第二次大起义开始后制造了一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这在以色列社会制造了极大恐慌。在哈马斯领导人眼中,自杀式袭击本质是防御性的,即对以色列暴力的对等回应,以方的过度暴力行为经常伤及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因此有必要让以色列民众体验巴勒斯坦人的痛苦。<sup>③</sup> 哈马斯暴力对抗以色列方式的转变,导致以色列对哈马斯威慑方式发生变化。以 2002 年的内坦亚酒店爆炸事件为转折点,以色列下定决心中止巴以和平进程,开始推行拒止性威慑,即修建隔离墙,“定点

---

<sup>①</sup> Ahron Bregman, *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London: Allen Lane, 2014, p. 306.

<sup>②</sup> Mosab Hassan Yousef, *Son of Hamas: A Gripping Account of Terror, Betrayal, Political Intrigue, and Unthinkable Choices*, Carol Stream,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11, pp. 96-122.

<sup>③</sup> Mark Juergensmeyer,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 71.

清除”哈马斯高层。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随着隔离墙的修建,哈马斯自杀式袭击的次数、造成的伤亡数均出现显著下降:从2001年的近20次、伤亡近700人,到2007年的双双归零。<sup>①</sup>面对以色列积极推行的拒止性威慑,哈马斯也在积极转变应对策略。2004年开始,哈马斯使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的次数显著增加,逐步取代自杀式爆炸袭击,成为其对抗以色列的主要方式。同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去世,巴勒斯坦政坛出现巨大权力真空,给哈马斯转变斗争策略带来契机。在2005年9月至2006年6月的8个月内,哈马斯未对以色列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为赢得巴勒斯坦选举而暂时放弃暴力活动,符合哈马斯的利益,也从侧面体现出其作为政治组织的理性与实用主义特质。在2006年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赢得了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132个议席中的76个,民意基础牢固,极大提升了其对抗以色列的自我效能感。

综上,面对以色列威慑,该时期的哈以互动为哈马斯塑造了正向反馈。第一,哈马斯在此阶段坚信该组织能够永久生存下去。只要巴勒斯坦民众坚持反抗以色列的压迫,哈马斯的“基本盘”就很稳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哈马斯的重建就是最好的例证。无论以色列如何施加威慑都无法阻止哈马斯的崛起。第二,哈马斯在此阶段加深了对“持续进行武装抵抗能够获得成果”的预期,以斗争求和平成为哈马斯内部的共识。2003年以色列从加沙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让哈马斯意识到,即使对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持续的抵抗依然可以迫使强大的敌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并且,哈马斯在抵抗中坚持的强硬立场与法塔赫的绥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为其攫取了更多政治资本,赢得更多民意支持。第三,通过赢得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进一步相信,对外暴力斗争和政治斗争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哈马斯可以与以色列边打边谈。尽管受到以色列的打击,但哈马斯一方面展现出不屈的抵抗精神,另一方面通过选举使自身的政治地位合法化。

### (三) 2007年以来的哈马斯对以斗争与哈马斯的正向反馈

2006年6月25日,哈马斯卡桑旅联合其他两个武装组织共同发起了一次大

---

<sup>①</sup> Charles P. Kirchofer, *Israel Deterring Hamas: Tactical Successes and Strategic Challenges*, Ph. D. dissertation, King's College London, 2016, p. 156.

胆的越境突袭行动,绑架了年仅 19 岁的以色列国防军边防士兵吉拉德·沙利特 (Gilad Shalit)。这次绑架行动可以被看作是 Hamas 对以色列施压的反击行动。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沙利特一直被 Hamas 扣押在加沙,后经过长时间谈判,直到 2011 年 10 月以色列政府以释放 1,027 名巴勒斯坦囚犯为条件,最终换回沙利特。以色列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中还包括 2023 年 10 月“阿克萨洪水”行动的总策划者叶海亚·辛瓦尔 (Yahya Sinwar) 以及关键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 (Muhammad Deif) 等重要军事领导人,这次行动加深了 Hamas 对“通过武力和谈判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政治目标”的历史经验习得。

在 Hamas 赢得选举后,巴勒斯坦内部本就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进一步恶化,内战再次爆发。以色列既“作壁上观”,又尝试通过各种渠道支持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只不过这次结局出乎预料,法塔赫被赶出了加沙。时任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阿莫斯·亚德林 (Amos Yadlin) 却对这种情形表达了乐观的看法:“这对于以色列实施威慑战略是好事,因为 Hamas 至此不再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了,而是一个‘准敌对国家’。”<sup>①</sup>从 2007 年开始,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的商品,包括建筑材料、燃料、食品等在内的 42 种关键生产生活用品受到限制。以色列还禁止大部分从加沙地区的出口商品,这严重影响了加沙经济,通往以色列的唯一出入口埃雷兹过境点几乎完全被关闭,加沙的失业率迅速飙升至世界最高水平,80% 的加沙居民依赖联合国近东工程救济处的粮食与医疗救济。<sup>②</sup>以色列这种极限施压使加沙民怨沸腾,但加沙民众对现状的绝望并未动摇 Hamas 的统治,因为他们普遍将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归咎于以色列的封锁。

不对称冲突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强势方往往面临比弱势方更大的心理压力。2006 年以色列国防军对真主党的地面行动虽然增强了震慑效果,但以军同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伤亡,这在以色列国内招致批评。Hamas 观察到以色列内部的分歧,评估认为, Hamas 的生存与持续抵抗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信息时代

---

<sup>①</sup> Amos Yadlin and Richard Jon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 Yadlin Comments on Gaza, Syria and Lebanon,” Cable: 07TELAIV1733\_a, June 13, 2007,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cable/2007/06/07TELAIV1733.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11 月 28 日。

<sup>②</sup> “The Blockade of Gaza, 2007–2010,” *Factsheet Series*, No. 088, *Canadians for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June 2010, [https://www.cjpme.org/fs\\_088](https://www.cjpme.org/fs_088), 上网时间:2024 年 11 月 28 日。

的战争在世界各地电视屏幕上实时播放,而作为强权方的以色列在进行军事行动后常因国际谴责而受到反威慑,弱者受到国际社会同情,往往成为正确的一方。故 2008 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无法通过“铸铅行动”对哈马斯斩草除根——他的目标不是推翻哈马斯,而是在避免彻底剿灭哈马斯的前提下施加惩罚性威慑,底线诉求就是让哈马斯停止发动火箭弹袭击,双方在最终的停火谈判中也成功达成了默契。2010 年至 2011 年,哈马斯非但没有主动发起挑衅,反而在加沙监督并惩罚包括杰哈德在内的激进势力。

也正是从“铸铅行动”开始,以哈互动更趋规律化,即哈马斯采取暴力活动——以色列予以报复性打击——加沙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双方停火休战——酝酿新一轮暴力。这种暴力的起点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火箭弹袭击,高潮是以色列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报复,结局是哈马斯受重挫、加沙面临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放松对加沙的封锁,后续是相关各方酝酿下一次冲突,循环往复。<sup>①</sup>

2014 年“护刃行动”结束后,哈以双方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三年,冲突始终维持在低烈度层面。直到 2017 年年底,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巴勒斯坦人。2018 年 3 月,加沙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被称为“伟大回归游行”(Great March of Return),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以及要求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哈马斯既是抗议的支持者和发起者,也是导致暴力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随后以色列出动军队镇压抗议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作为回应,哈马斯重启针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

2021 年 5 月巴以之间在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社区再次爆发冲突后,哈马斯开始进入新一轮“蛰伏期”,对以色列保持了近两年相对“温和”姿态,这从今天看来更像是一种“战略欺骗”。2022 年 10 月,分裂超过 15 年的巴勒斯坦各派签署新的和解协议,承诺一年内举行选举。<sup>②</sup> 2023 年初,以色列允许近 18,000 名来自

① 牛新春:《加沙冲突的背景与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11 期,第 28 页。

② “Palestinian Factions Sig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in Algeria,” *Al Jazeera*, October 13, 2012, <http://www.aljazeera.com/amp/news/2022/10/13/palestinian-factions-sign-reconciliation-agreement-in-algeria>, 上网时间:2024 年 11 月 28 日。

加沙的劳工赴以色列工作,他们的工资比加沙本地高出约 10 倍。<sup>①</sup> 以色列安全机构将“胡萝卜政策”视为保持局势相对平静的方法之一,错误预判了哈马斯的动机,认为其正朝着更注重巴勒斯坦人民发展福祉的方向转型。根据英国《卫报》推测,哈马斯早在 2019 年的加沙边境抗议活动中就已开始相关斗争准备工作。借助长时段细致的侦察,它早已对隔离墙的安全弱点及以军巡逻模式了如指掌。<sup>②</sup>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发动的突袭行动是一套构思缜密、海陆空协同、相互配合的闭环战术。这场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掩护主力部队尽可能多地抓俘以方人员,在收缴战利品后快速回撤至加沙,转攻为守,为应对后续以军加倍报复囤积政治筹码。至此,新一轮加沙冲突爆发,这不仅是哈马斯命运的新转折点,更是以色列对哈马斯所奉行的基于威慑的“割草战略”转折点。<sup>③</sup>

在以色列威慑战略下,这一时期的哈以互动为哈马斯塑造了三种正向反馈。第一,沙利特事件的经验强化了哈马斯通过“武力加谈判”实现政治目标的认知,使其笃信武力不仅能够施加压力,还可以增加谈判筹码以获取实质性回报。这一成功的先例为哈马斯在此后与以色列的对抗提供了样板。第二,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和经济制裁虽然对哈马斯执政和加沙民众生活造成了巨大压力,但这种极端的施压政策同时也激发了哈马斯及加沙平民更强烈的抵抗情绪。当民意趋向于支持哈马斯发动武力抵抗时,以色列威慑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第三,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迫使哈马斯对以色列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否

---

① Tia Goldenberg, “What Went Wrong? Questions Emerge over Israel’s Intelligence Prowess after Hamas Attack,” *AP News*, October 9,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israel-hamas-gaza-attack-intel-a5287a18773232f26ca171233be01721>, 上网时间:2024 年 11 月 28 日。

② 参见 Dan Sabbagh, “Hamas Drew Detailed Attack Plans for Years with Help of Spies, Documents Suggest,” *The Guardian*, December 4,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dec/04/hamas-drew-detailed-attack-plans-for-years-with-help-of-spies-idf-says>;此外,根据“X”平台相关分析推测,哈马斯早在 2019 年就开始了针对以色列的测试性挑衅,参见 Pierre Rehov@rehoov, November 24, 2024, <https://x.com/rehoov/status/1860591216800186742>, 上网时间:2024 年 12 月 8 日。

③ 马晓霖、杨府鑫:《哈马斯混合战争视角下的以色列国家安全漏洞探析》,载《国家安全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23-24 页。

则巴勒斯坦事业将功亏一篑。<sup>①</sup>这使得哈马斯在面对以色列的威慑时会选择不计损失地进行抗争。

综上所述,从历史经验习得的角度看,以色列威慑哈马斯难以取得效果,其背后的原因是哈马斯打破沉默、主动发起进攻。哈马斯之所以选择进攻,在于其与在以色列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抵抗虽有代价但收益更高”的正向反馈,它是哈马斯持续进行军事抵抗背后自我效能的重要来源。

#### 四、政治维度的正义事业必胜信念：哈马斯反抗以色列的情感动力

如果说历史经验习得是哈马斯抵抗以色列的工具理性逻辑,其关注的重点是对抗以色列时的绝对收益;正义事业必胜信念解释的就是处于价值理性状态下的哈马斯,“反殖民论”“荣誉论”以及“联合全球亲巴力量”分别回答了哈马斯坚持抗争的核心缘由、精神支撑与实践目标,由此产生的自我效能感从主观上弱化了哈马斯对于抵抗损失的关注,使其能够不计得失地坚持抵抗事业,以色列的威慑战略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 (一) “反殖民论”：哈马斯抵抗以色列的核心动机

哈马斯为何在高成本和以哈权力极端不对称条件下持续抵抗以色列?从价值理性来看,其核心动力就是对抗争正义性的认识。多年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的严格封锁与集体惩罚,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并将其合法化,对巴勒斯坦犯罪嫌疑人未经审判任意处置等行为都已违反《海牙公约》(1907年)与《日内瓦(四)公约》,被哈马斯视为典型的新殖民主义行为,这让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方各派力量认为实施武装抵抗存在道义与法理依据。心理学家、反殖民活动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他的著作《地球的悲惨者》一书中将去殖民化视为正义的行为:“对于被殖民者来说,最根本的价值,也最具体的价值,首

---

<sup>①</sup> Marcus Walker and Summer Said, “ Hamas Wanted to Torpedo Israel-Saudi Deal With Oct. 7 Attacks, Documents Reve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8,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hamas-wanted-to-torpedo-israel-saudi-deal-with-oct-7-attacks-documents-reveal-a70-ec560>, 上网时间:2026年4月9日。

先是土地:这片土地将为他们带来面包,以及最重要的尊严。”<sup>①</sup>2012 年,时任哈马斯政治局主席迈沙阿勒在哈马斯成立 25 周年纪念活动上说:“巴勒斯坦从河流到海洋,从北到南,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一寸土地。”<sup>②</sup>哈马斯著名军事领导人萨利赫·阿鲁里(Saleh al-Arouri)更是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明确指出:“对我们穆斯林来说,这不是一场宗教战争,因为我们在 1948 年前就生活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基于宗教的种族灭绝,这场战争的爆发全归于以色列的非法占领。”<sup>③</sup>

在哈马斯看来,犹太人定居点是以色列新殖民主义的标志性符号。今天狭义上的犹太人定居点主要指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在被占土地上修建的居民区,巴勒斯坦则称其为“以色列殖民地”。在巴勒斯坦方面看来,定居点既违反国际法,又从根本上破坏了他们实现国家独立的机会。有巴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群生活在其故土的人和一群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发生了冲突,后者却认为前者的土地是他们的专属区,由此爆发冲突。”<sup>④</sup>还有评论家坦言,巴勒斯坦领导人接受一个仅占这片土地面积 22% 的巴勒斯坦国,已经作出了巨大让步。<sup>⑤</sup> 即便如此,以色列的定居点还在约旦河西岸大肆扩张,以色列眼中的胜利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总之,在巴以双方近乎完全对立的土地归属叙事上,定居点问题成为不定期触动哈马斯“抵抗神经”的导火线。自 2006 年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发生的数次大规模地面冲突与以色列右翼势力持续扩大定居点有关。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4 月,在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斡旋巴以冲突期间,以

---

<sup>①</sup>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Constance Farrington, trans.,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5, p. 43.

<sup>②</sup> Nidal al-Mughrabi, “Hamis Chief Ends Gaza Visit with Palestinian Unity Call,” *Reuters*, December 11, 201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hamis-chief-ends-gaza-visit-with-palestinian-unity-call-idUSBRE8B911E/>, 上网时间:2024 年 11 月 28 日。

<sup>③</sup> Beverley Milton-Edwards, *Hamis: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 15.

<sup>④</sup> Robert Rotberg,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 History’s Double Helix*,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18.

<sup>⑤</sup> Afif Safieh, “Mr. Obama, There Is Still Time to Remake the Middle East,” *The Independent*, March 22, 2015,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mr-obama-there-is-still-time-to-remake-the-middle-east-10125158.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11 月 28 日。

色列表面上积极参与谈判,实际却大规模扩建和平协议规定的必须拆除的定居点。事实上,在和谈时期加速定居点扩张早已成为以色列主动破坏和谈的惯用做法。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斡旋时就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以色列阻碍和平比推动和平要容易的多。”<sup>①</sup>以色列一直用实际行动向外界传达明晰的信号——它不打算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保留土地,反而寻求加强对既得利益的控制。<sup>②</sup>不出所料,巴以和谈屡屡以失败告终,此后巴以官方之间再无和谈意愿,和平进程戛然而止。

哈马斯的反殖民叙事作为其“正义事业必胜信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出了其必须抵抗以色列的理由。事实上,以色列的每一次扩张事件都构成对哈马斯的“累积刺激”而非“累积威慑”,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被视为肇始于1948年的历史性压迫即“浩劫”(Nakba)的延续。西岸定居点附近时常发生的暴力事件乃至小规模冲突常常会蔓延至加沙,抵抗是哈马斯的核心意识形态与立足之本,其有主动扛起正义抵抗大旗的义务,因此可以看到它常以“保卫耶路撒冷”或“反对占领”等口号进行政治动员<sup>③</sup>,开展武装袭击和报复行动,这加速了以色列威慑战略的失灵。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虽能从肉体上消灭哈马斯人员,但却难以动摇其抵抗信念,反而强化抵抗决心。受反殖民话语驱动的正正义事业必胜信念,使弱势一方化被动为主动,继而导致以色列威慑战略的结构性失效。

## (二)“荣誉论”:哈马斯抵抗以色列的精神支柱

在以色列的认知中,哈马斯是典型的“恐怖组织”,对其采取的行动就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在不对称冲突面前,哈马斯的应对选项非常有限,其抵抗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这种绝处逢生的心态促使哈马斯坚持武装抵抗。2023年10月新一轮加沙冲突标志着以色列对哈马斯政策

<sup>①</sup> Dai Richards et al., *The 50 Years War: Israel and the Arabs*, Edition 5, 34: 57-35: 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YKvj9c9JA&list=PLpoX921v2BDLjkwGwRdop6ixeQt4YK-CSJ&index=5>, 上网时间:2026年4月24日。

<sup>②</sup> “Israeli Settlements Throughout History,” *Fanack*, March 25, 2011, <https://fanack.com/arab-palestinian-israeli-conflict/israeli-settlements-new/israeli-settlements-throughout-history/>, 上网时间:2024年11月28日。

<sup>③</sup> ToI Staff, “ Hamas Chief Says War Foils Israel’s Attempts at Arab Coexistence, Normalization,” *The Times of Israel*, May 21,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hamas-chief-says-war-foils-israels-attempts-at-arab-coexistence-normalization/>, 上网时间:2026年4月9日。

的根本性转变——从惩戒式打击转向彻底根除。但在政策操作层面,以色列既要尽可能削弱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又刻意保留哈马斯的残余力量,以实现“分而治之”。<sup>①</sup> 任何政策皆具内在张力,这种敌对共存模式,实际上以一种更为隐蔽且渐进性的方式威胁着哈马斯的生存。

以色列虽默认哈马斯在加沙拥有治权,但在严格封锁之下,多轮打击蝉声的累积效应严重限制哈马斯再武装的速度,哈马斯因此被迫将用于民生恢复的资金用于修建地道等军事项目,这导致加沙失业率、贫困率飙升,民生恶化,造成严重的治理赤字。此外,哈马斯极度依赖外部援助,特别是依赖卡塔尔提供的资金,以色列则以“三角威慑”<sup>②</sup>的形式,试图通过封锁和激励相结合来“驯服”哈马斯,借其力量压制更为激进的圣战萨拉菲等派别,以图分裂哈马斯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哈马斯军事派别卡桑旅具有高度独立性,故哈马斯一边参与和谈,一边发动袭击的矛盾场景屡见不鲜,这往往招致以色列更为强烈的打击,使哈马斯元气大伤。

因此,哈马斯必须将不定期主动进攻以色列视为释放内部压力、凝聚内部共识的途径。如果它无法将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动员工具,其统治加沙的合法性就会丧失。统计结果显示:2003 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区单方面撤军后,以色列每次对哈马斯发动大规模打击,哈马斯的声望往往会上升,最高点出现在 2012 年 12 月和 2014 年 9 月,都是在加沙冲突升级之后。而每当巴勒斯坦民众认为哈马斯没有采取支持巴勒斯坦人事业的重大行动时,它的声望就会下降:一次是在 2010 年 9 月,另一次是在 2012 年 3 月,当时哈马斯没有参与和谈,也没有与以色列对抗。<sup>③</sup> 由此可见,哈马斯主动寻求冲突反而有利于其在以色列的“割草战略”中生存下去。但是这就存在一个悖论:不对称冲突中的弱势方如何在必须承受巨大代价的情况下坚持作战? 哈马斯的答案就是“荣誉论”,强调为了巴勒斯坦的荣

---

① Tamer Qarmout, “What is Behind the Palestinian Split and What Makes It Difficult to End?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rom a Settler Colonial Len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4, No. 4, 2023, pp. 691–692.

② Boaz Atzili and Wendy Pearlman, “Triadic Deterrence: Coercing Strength, Beaten by Weakness,”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301–335.

③ Charles P. Kirchofer, *Israel Detering Hamas: Tactical Successes and Strategic Challenges*, p. 218.

誉而战,由此带来的不对称作战模式就是主动发动一场“有去无回”的袭击。

以辛瓦尔为代表的哈马斯高层以“殉道观”为依托,多次呼吁对以色列实施不对称作战。<sup>①</sup>因此,对以发动自杀式袭击被哈马斯成员视为一项荣誉。对以色列社会产生较大震慑力的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严重的自杀式袭击,如内坦亚酒店袭击事件。由于正值犹太逾越节,以色列安保松懈,袭击造成30人死亡、140多人受伤。<sup>②</sup>“荣誉论”也体现在哈马斯领导人的政治动员话语中。2018年,加沙伊斯兰教法上诉法院的法官谢赫·奥马尔·诺法尔(Sheikh Omar Nofal)在接受哈马斯阿克萨电视台采访时,公开赞扬了殉道的6种美德,并指出“巴勒斯坦的圣战是所有穆斯林都义不容辞的责任”。<sup>③</sup>

“荣誉论”还体现在哈马斯的核心意识形态中。1988年发布的《哈马斯宪章》第十一条指出: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认为,巴勒斯坦土地世代代都是宗教公产(وقف),不属于任何国家或者君主,任何人都不能放弃它或它的任何一部分。<sup>④</sup>这种决不妥协立场表明:只要哈马斯始终忠于其创始原则,就不可能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sup>⑤</sup>在哈马斯看来,只要以色列一日存在,该组织的抵抗就不会消亡;在巴勒斯坦正义事业中阵亡,对哈马斯而言是一种荣誉。“荣誉论”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不可持续的“抵抗—伤亡—失败”恶性循环扭转为“抵抗—殉道—成功”的“良性循环”。

“荣誉论”为哈马斯提供了精神力量。据以色列方面估计,2025年加沙地带

---

① Yusuf Dhia-Allah, “Yahya Sinwar: Palestine’s Courageous Warrior Achieves Eternal Life in Martyrdom,” *Crescent International*, November 1, 2024, <https://crescent.icit-digital.org/articles/yahya-sinwar-palestine-s-courageous-warrior-achieves-eternal-life-in-martyrdom>, 上网时间:2026年4月14日。

② “Passover Suicide Bombing at Park Hotel in Netanya,”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rch 27, 2002, <https://www.gov.il/en/pages/passover-suicide-bombing-at-park-hotel-in-netanya>, 上网时间:2024年11月28日。

③ “On Hamas TV, Gaza Judge Omar Nofal Extolls the Six Virtues of Martyrdom, Says: Jihad in Palestine Is an Individual Duty Incumbent upon All Muslims,” *Memri TV*, July 22, 2018, <https://www.memri.org/tv/gaza-judge-omar-nofal-extolls-martyrdom-jihad-in-palestine-%20duty>, 上网时间:2024年11月28日。

④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宪章(1988)》(网站),半岛电视台网站,2017年5月2日, <https://www.aljazeera.net/encyclopedia/2017/5/2/1988-ميثاق-حركة-المقاومة-الإسلامية-حماس>, 上网时间:2026年4月3日。

⑤ Azzam Tamimi, *Hamas: A History from Within*, pp. 156–157.

的哈马斯成员数量几乎恢复至战前水平——旧成员死亡后立刻就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军填补空缺。哈马斯领导层虽然被瓦解,但基层战斗小组仍然活跃,更重要的是哈马斯群众基础仍然强大。据估计,在加沙每 20 人中,就有 1 人以某种方式与哈马斯有关联。<sup>①</sup> 在 2025 年 10 月 10 日停火协议生效后,哈马斯不仅巩固了控制权,还开始打击在战争期间与以色列合作的团伙。<sup>②</sup> 以色列军方也多次承认:“哈马斯是一种意识形态,恐难彻底消灭。”<sup>③</sup>

综上所述,抵抗是哈马斯在没有选择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哈马斯若对以色列采取绥靖政策,非但无法换来和平与生存,反而可能招致更快的覆灭,这迫使哈马斯不计成本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其观念支撑就是“荣誉论”。这种观念深植于哈马斯的宗教意识形态中,通过领导人与成员传播并付诸实施。在他们看来,这是正义事业必胜信念的最好诠释,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正如马克·尤尔根斯迈尔(Mark Juergensmeyer)所总结的那样:“宗教革命者常常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宇宙之战’,将世俗的斗争提升到精神层面的巨大对抗中。这套话语赋予暴力行为以神圣的正当性,使参与者相信他们在进行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终极战斗。”<sup>④</sup>

### (三) “联合全球亲巴力量”: 哈马斯抵抗以色列的实践目标

纵览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冲突与战争,战争的双方常常都追求“师出有名”。哈马斯作为加沙的政治实体,对内寻求统治合法性,对外增强斗争合法性,因此亟需联合全球亲巴力量,这是哈马斯正义事业必胜信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不少巴勒斯坦人心中,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而是名副其实的合法政权与正义抵抗力量。2006 年的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委员会选举就是巴勒斯坦民意

<sup>①</sup> Arshi Qureshi, “In Gaza, Hamas Regenerates Itself Despite Israeli Attacks,” *Pass Blue*, June 30, 2025, <https://passblue.com/2025/06/30/in-gaza-hamas-regenerates-itself-despite-israels-rentless-killings/>, 上网时间:2025 年 9 月 9 日。

<sup>②</sup> Yazan Alhamdan, “Disarming Hamas: What Analysts Get Wrong,”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 March 2, 2026,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disarming-hamas-what-analysts-get-wrong/>,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9 日。

<sup>③</sup> 《以军发言人称哈马斯为意识形态无法消灭,政府重申立场》,载《联合早报》2024 年 6 月 20 日,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240620-3951996>, 上网时间:2025 年 9 月 9 日。

<sup>④</sup>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69-79.

最好的例证。此次选举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共设有 1,008 个投票站,共有约 140 万巴勒斯坦人参与投票,其中 728 名候选人竞争议会的 132 个席位。900 多名国际观察员和 1.8 万本地观察员负责监督投票过程,确保选举公正。<sup>①</sup> 最终,哈马斯用西方推崇的民主选举方式合理合法地击败法塔赫,获得 132 个席位中的 76 个,结束了法塔赫统治巴勒斯坦政坛的局面。

哈马斯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还表明,加沙民众普遍认为加沙今天的悲惨现状,完全是美西方“拒绝接触”与以色列的“封锁围困”所造成的。2023 年 3 月巴勒斯坦政策与服务研究中心(PCPSR)的报告指出,74%的巴勒斯坦人认为,由于以色列扩张定居点,两国方案已不再现实。”<sup>②</sup>显然,以色列的蚕食政策导致“两国方案”边缘化。“两国方案”倘若走不通,摆在巴勒斯坦人面前的就只剩下抵抗了。这对于哈马斯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只要抵抗信念存在,哈马斯就能一直存在,以色列的威慑就注定是徒劳。

其次,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赞成哈马斯以“军民混合”为基础,将以色列平民作为打击目标。但哈马斯斗争本身的合法性存在争议,部分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反恐叙事”,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2023 年 10 月 7 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至少 19 个国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其中出现了两波集中承认潮:第一次发生在以色列执意对拉法采取军事行动、南北夹击加沙之后;第二次发生在以色列在加沙地区采取“饥饿政策”后。联合国官方认为,以色列的行动造成加沙爆发严重的饥荒。截至 2025 年 11 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仅美国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总数达 157 个,仅与承认以色列国家的数量相差 9 个。哈马斯将自己的军事斗争与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相挂钩,试图扩大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国际范围,获取更多国际道义支持。

除国际承认外,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也不断改善,与同期以色列的国际形象急速恶化形成鲜明对比。2024 年 5 月,由阿联酋代表阿拉伯国家提交

① 杨伟国、王雁芬:《见证巴勒斯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4 页。

② Edward Djrejian and Nicolas Pantelick, “Beyond Oslo: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 A Report on a Student Study Group,”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p. 18,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antheon\\_files/files/publication/Beyond%20Oslo%20Report%20Middle%20East%20Study%20Group\\_Final\\_0.pdf](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antheon_files/files/publication/Beyond%20Oslo%20Report%20Middle%20East%20Study%20Group_Final_0.pdf),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3 日。

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决议”获 143 票赞成。<sup>①</sup> 同年 9 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巴勒斯坦代表首次在会员国席位中就座,这被巴解官方通讯社称为“历史性时刻”。<sup>②</sup> 2025 年 7 月,30 多个“全球南方”国家在波哥大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协调国际刑事法院追究以色列战争责任并提议对以色列实施“全面制裁”,<sup>③</sup> 这使以色列处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

受正义事业必胜信念驱使, Hamas 对于巴以冲突的走势判断一直充满信心。2021 年至 2023 年间,辛瓦尔的一系列信件和演讲文稿,描述了一场与伊朗、真主党及其他地区代理人协调展开的“伟大战役”。用他的话说,“抵抗轴心”斗争的目标就是“根除这个扭曲的实体(以色列)”并“改变该地区的面貌”。<sup>④</sup> 在地区盟友的支援下, Hamas 领导层笃信它的目标可以实现——摧毁以色列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行动战略。这些观点并不仅限于 Hamas 的高层,而且在基层广泛传播,在巴勒斯坦公众当中引起了共鸣:35%的巴勒斯坦人将以色列形容为“一个脆弱且支离破碎、即将分崩离析的国家”。<sup>⑤</sup>

在伊朗领导下的“抵抗轴心”势头正盛时, Hamas 与巴勒斯坦民众对于巴以冲突的乐观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信息茧房”,提升了对抗以色列的决心。在这种强自我效能感驱使下, Hamas 将其对抗叙事转化为“反威慑”工具,试图建立地区反以联盟,包括伊朗、Hamas、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形成了“抗争的共同体”。 Hamas “浩劫”叙事有助于其进行“受害者共同体”的建构,对于消弭巴内部派系斗争、促成“抵抗轴心”大团结铺平道路;定

---

① 《联大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建议安理会重审巴勒斯坦入联申请》,联合国,2024 年 5 月 10 日, <https://ews.un.org/zh/story/2024/05/1128601>, 上网时间:2025 年 8 月 15 日。

② 《“历史性时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大会的正式席位》(阿拉伯文),巴勒斯坦通讯社,2024 年 9 月 12 日 <https://www.wafa.ps/Pages/Details/103496>, 上网时间:2025 年 8 月 15 日。

③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Emergency Conference on Palestine,” *The Hague Group*, July 16, 2025, <https://dirco.gov.za/wp-content/uploads/2025/07/Bogota%E2%80%94THG%E2%80%94emergency%E2%80%93conference%E2%80%93statement.pdf>

④ Uri Rosset, “Hamas’ Strategy to Destroy Israel: 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 as Seen in Captured Documents,” *The Meir Amit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March 13, 2025, pp. 8–14, [https://www.terrorism-info.org.il/app/uploads/2025/03/E\\_051\\_25.pdf](https://www.terrorism-info.org.il/app/uploads/2025/03/E_051_25.pdf), 上网时间:2026 年 4 月 9 日。

⑤ Joshua Adam Saidoff, *Fleeting Deterrence and Enduring Intractable Conflict: The Case of Hamas vs. Israel*,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25, p. 154.

居点叙事将以色列塑造为“殖民强权”，使哈马斯暴力抵抗超越以色列关于哈马斯恐怖主义的叙事框架，转而嵌入反殖民话语体系，吸引全球亲巴力量支持；哈马斯的性质决定其适合将宗教抗争与民族解放叙事进行深度捆绑，继而将巴以冲突包装为“伊斯兰文明存续之战”，促使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组织履行宗教义务。

综上所述，哈马斯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军事组织，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深度嵌入巴勒斯坦政治社会结构中。<sup>①</sup> 这使得以色列试图在话语层面将“哈以冲突”从“巴以冲突”中剥离的做法面临客观阻碍。在区域地缘博弈背景下，哈马斯的行动还获得部分国家及非国家武装组织的支持，这构成了其长期抵抗的外部支撑。以色列对哈马斯威慑失灵的根源，在于哈马斯的自我效能感。正如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所指出的：“打死一名‘哈马斯’，会有千百个‘哈马斯’站出来；哈马斯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的民意。”<sup>②</sup>

## 五、结语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威慑为什么经常失灵，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分析视角从威慑方转向受慑方，从物理层面转向观念层面，以“自我效能感”这一认知心理学因素作为解开哈马斯“不屈服”迷思的核心因素。本文认为，哈马斯的历史经验习得与正义事业必胜信念共同构成了它面对以色列威慑时的自我效能感，导致以色列威慑失灵。历史经验习得使哈马斯将以色列的威慑视为一种虚张声势，坚信可以通过不对称打击做到以弱制强、以小博大。以色列的威慑战略试图吓阻哈马斯，而哈马斯却在近40年抵抗经历中获取一系列正向反馈，认为在反以斗争中从防御转向进攻，从被动转向主动，能够使以色列的威慑失去效用；正义事业必胜信念则从价值理性的视角解构了威慑生成的逻辑。它本质上属于一种情绪力量，通过引入“荣誉”，在收益—成本核算中弱化抵抗损失，笃信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必将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sup>①</sup> Amos Oz, “Israeli Force, Adrift on the Se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06/02/opinion/02oz.html>, 上网时间:2025年9月22日。

<sup>②</sup>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新华网，2003年6月15日，转引自搜狐网，<https://news.sohu.com/00/82/news210138200.shtml>，上网时间:2025年9月25日。

首先, 哈马斯在与以色列近 40 年的互动中, 并非盲目出击, 而是基于工具理性不断从经验中学习并形成积极反馈。无论是早期争取生存空间, 还是通过暴力抵抗提升政治声望、诱发以色列过度反应以博取国际同情, 还是后来通过选举获胜、在沙利特事件中与以色列斗智斗勇, 都在不断巩固自己的过程中实现“以小博大”的斗争效果。这些基于客观现实的历史经验习得使哈马斯坚信胜利属于巴勒斯坦, 极大地削弱了以色列威慑的效果。

其次, 本文剖析了正义事业必胜信念的三大支柱。一是哈马斯的“反殖民论”, 这种认知将抵抗视为正义之战与崇高事业并提供了强大的道义感召力。二是作为宗教激进组织的哈马斯推崇“荣誉论”, 强调在巴勒斯坦正义事业中阵亡是无限光荣的, 这从价值理性的高度解构了以色列武力威慑的生效逻辑。三是哈马斯坚信它将作为高举反以大旗“先锋”, 为巴勒斯坦事业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更多支持, 并进一步推动区域“抵抗轴心”的壮大。

总之, 国际安全博弈中, 以暴制暴虽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却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以色列的威慑失灵, 根源在于其军事优势无法撼动哈马斯由历史经验而产生的“以弱制强必胜信念”, 以及由反殖民论等所产生的“正义事业必胜信念”, 军事逻辑与政治逻辑中的两大信念共同铸就自我效能感。哈马斯不仅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 更是一种深植于巴勒斯坦特定历史与社会土壤中的“抵抗意识形态”。任何旨在化解冲突、构建持久安全的策略, 若仅着眼于军事打压而忽视受威慑方背后的信念体系, 即便取得战术性胜利, 也难以从战略上战胜对手。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